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

第三章 暴力殺戮 惡貫穹宇

引言：共產邪靈一路殺

說起共產黨，人們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個字：殺。共產黨的殺，大多發生在和平時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領的地盤上。中共肅反就殺了10萬紅軍，後來的延安整風、土改鬥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後的一連串政治清洗運動，殺人無數。

無論是戰爭，還是歷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敵人才去殺人。共產黨是反其道而行之，為了殺而去找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人來殺。

共產黨為什麼嗜殺？因為「殺」是共產邪靈為其終極目的在人間布下恐怖之場的戰略措施。共產黨把「殺」當作了一門「學問」，一種「藝術」，把「殺」做到了極致。

共產黨怎麼殺？用刀把子殺，用飯碗殺，用輿論殺。

用刀把子殺，就不用多說了，對於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共，那是看家本領。

什麼叫「用飯碗殺」？就是卡住人的飯碗，不服就不給飯吃。多少知識分子，被共產黨用飯碗逼得下跪。中國的士人，自古以來，都講骨氣，不為利誘所動。古時候，沒有了官家的俸祿，還可以自謀生路。典故「不為五斗米折腰」說的就是陶淵明受不了貪官的侮辱，還可以豪氣萬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中共把所有的社會資源全部控制起來，不給飯碗，人就只有死路一條。

用輿論殺人，也是共產黨的一大特色。因為掌控了一切輿論工具，想打倒誰，就打倒誰；說誰是壞人，誰就是壞人；說誰有罪惡的一生，誰就有了罪惡的一生。

共產黨殺的是什麼？共產黨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爭，所以是殺天、殺地、殺人。

殺天——以「無神論」的名義殺掉對神佛的信仰，為「無神論」開道；

殺地——以改造山河的名義踐踏自然，破壞環境，實踐「無神論」無法無天的「大無畏」；

殺人——殺同黨，把滿足不了黨邪惡要求的成員清洗掉，以強化提煉黨性的邪惡；有針對性地殺精英，殺掉那些對實施邪靈計劃有阻礙的人，包括作為文化傳承者的社會精英；漫無目的地濫殺，挑動群眾鬥群眾，為的是營造和維持那個殺氣騰騰的恐怖場。

殺，有幾重目的。一是消滅被製造出來的敵人；二是讓殺人者手上沾滿鮮血，與黨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和共產黨一條心，變

成共產黨的殺人工具；三是打造紅色恐怖的環境，震懾所有人。這一切的「殺」，都是為其破壞文化、敗壞道德開路的。

特別是共產黨對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識分子的屠殺，是有意製造文化斷層，割斷後人與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聯繫。這是讓人類敗壞並走向最終毀滅的計劃中極為重要但卻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殺要殺到什麼時候？

共產黨的公開殺人，不光是用恐怖壓彎人的脊梁，還要將殺出來的恐懼融到人的血液裡，變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地傳承。

殺到這個地步，共產黨就會從公開殺轉成暗地裡殺。

「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文革」，那是公開殺，甚至號召群眾圍觀，就是要殺給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開地殺，事後矢口否認；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輪功，就不公開殺了，後來披露出的大規模活摘器官，那都是捂得嚴嚴實實地躲著殺。

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沒有「殺」來開路，要把「無神論」灌輸到中華大地，要把華夏民族變成「無法無天」的民族，要把中國的神傳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

1. 蘇俄預演

為了毀滅人類，共產邪靈首先要毀滅中華文化。「邪靈」挑選了中國的近鄰，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國蘇聯進行預演。蘇聯離中國很近，可以成為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為蘇聯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才能逃過剛剛建立時歐洲各國的圍剿以及後來二戰時德國的進攻，共產主義才得以在那裡苟延殘喘。

蘇聯剛剛建立，便用其國力「輸出革命」。它將中國作為輸出革命的重點，派遣維經斯基到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再通過鮑羅廷讓國民黨接受「聯俄容共」政策，以讓中共附體在國民黨上迅速成長。

蘇聯剛剛成立就試驗了以暴力殺人製造恐怖的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列寧認為「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賦予了契卡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研究表明，從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絞死和槍決的人數就達到數百萬。僅1921年一年，蘇共製造的饑荒就餓死了大約500萬人。

蘇聯的另一項重要試驗，是通過暴力建立起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共產邪說一統天下的局面。其它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宗教還是傳統文化自然都在消滅之列。

1917年攫取政權後，列寧立即大打出手，開始用暴力、高壓打擊正教、正信，破壞文化，迫使世人道德敗壞而離開神。這也是為了破壞中國文化進行的預演。

列寧一方面繼續宣揚無神論，「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上，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無可非議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1917年

布爾什維克掌權的第一天起，就把暴力毀壞文化、消滅對神的信仰作為其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

列寧死後，斯大林繼承衣鉢，於上世紀30年代開始了極其殘酷的大清洗，除了共產黨內的人士之外，知識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

斯大林曾向全國宣布要實施「無神論五年計劃」，在完成這個計劃之時，最後一座教堂將被關閉，最後一位神父將被消滅，蘇聯大地將變成「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絲宗教痕跡。

根據保守估計，在「大清洗」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達42,000多人。到1939年，整個蘇聯只有一百多座東正教教堂對外開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則有40,437座。全蘇聯境內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了98%。這一時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識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營，或被槍殺。

從斯大林死後直至蘇聯解體，蘇共政權都在繼續打擊各類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羅斯小說家、歷史學家索爾仁尼琴估計，斯大林共造成6,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因為中國是人類五千年大戲的舞台，人間正邪大戰要在中國上演最後一幕，所以蘇聯共產政權所扮演的預演角色完結後即煙消雲散，土崩瓦解，曾經喧囂一時的共產主義陣營也告解體。

2. 中共登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雖然法西斯主義被消滅，但卻催生了邪惡的「共產主義陣營」。其勢力最大時，占據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圖的三分之一。從殺人數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來看，中國共產黨是所有邪惡共產政權中最邪惡的。它在中國的文化滅絕行動就經過非常系統而精心的策劃。

中華傳統文化是創世主為了最後救度眾生，而在中國親自奠定的文化。毀掉中華傳統文化是共產邪靈的首要目標。它深知，暴力能夠毀滅的只是人的肉體，通過暴力及其它各種手段毀滅文化，才能夠毀滅中國人的靈魂。所以在有計劃地用暴力殘殺精英階層之時，它也摧毀著傳統文化中世人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質載體，進一步割斷神與人的聯繫，達到其毀滅傳統文化進而毀滅人的目的。

在暴力毀壞這些基石，讓這些精英消聲、消亡的歷次運動中，共產邪靈集人類惡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殺戮、強迫洗腦、欺騙鎮壓的各種手段和伎倆，為其今後正邪較量中登峰造極的最後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練。

與此同時，它們還有計劃地、系統地建立了邪惡的「黨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殺掉的世人，把他們變成共產邪靈繼續殺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產邪靈也深諳怎樣利用世間一切經濟利益、政治洗腦等手段讓世人就範，聽從其擺布。一次一次的運動、鎮壓、殺戮，使它們對這些手段越用越嫻熟。

3. 屠殺精英

鄉村中的地主、紳士階層及城市中的商賈、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這些文化精英幫助承傳著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毀掉這些精英們是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一步。於是，中共製造敵人，開始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

中共建政前後的所謂「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過暴力殺害農村的文化傳承者。中共顯然並不想把土地交給農民。它還是用一貫的伎倆，先給農民一點甜頭，在完成了農村對地主、鄉紳的屠殺和文化的毀壞後，立刻通過「合作化」收回了分給農民的土地。結果廣大的農民還是繼續受苦。

城市有產者也成了中共屠殺的對象。這既是為了搶劫他們的財富，也因為他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力量、傳統文化的承傳者，甚至是具備西方自由人權思想的群體。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傳播佛道修煉經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將矛頭對準文化中與信神直接相關的部分，即「宗教」，在經過屠殺、判刑、洗腦、強迫還俗、歪曲教義後，以完全聽命於中共的宗教痞子為首，建立佛教協會、道教協會等，將這些協會作為中共控制和摧毀宗教的工具。

無論是宗教中的出家人，還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將出現斷層。與剿滅宗教同步進行的是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通過所謂唯物主義、無神論和進化論教育，對學生系統地洗腦，灌輸對傳統文化的仇視。又通過「反右」運動，將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全部發配勞改，打入社會最底層，用「飯碗」

和「輿論」來殺，讓這些過去掌握話語權、主導社會輿論的「士大夫」成為被鄙視和嘲弄的對象。

「反右」之後，無論在家庭、學校裡，還是在社會上，都已經聽不到獨立的聲音。學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不僅不相信神佛，對於傳統的文化與藝術也毫無敬畏之心。但中共對此並不滿意，畢竟年歲稍大的人還保留著對傳統文化的記憶，文物古蹟等傳統文化的載體也隨處可見，傳統的價值仍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後被洗過腦的學生，利用他們青春期騷動而叛逆的心理發動了「破四舊」運動，讓中華文化陷入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對這些人的屠殺中，中共一舉數得，用意歹毒至極：第一，可以製造恐怖氛圍以嚇阻所有的反抗企圖；第二，洗劫社會財富以為己用，加強政權的力量；第三，將百姓置於貧窮和動蕩之中，讓百姓除衣食之外無暇他顧，不再有時間和精力接受教育、傳承文化；第四，讓百姓對這種暴力感到麻木，因為面對這樣的反人類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經、不想辦法說服自己認可殺人有理，就唯有奮起反抗一途。這個過程也就是挾持人的道德下滑的過程；第五，則造成中國文化的斷層，讓人喪失憑文化而最後得到創世主救度的機緣。

上述五個目的，現在中共已經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我們不妨從中共屠殺的方式和被殺的人數來加以分析。

1) 鄉村與城市中的屠殺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當時中國6億人口，至少有60萬人頭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最少在500萬人以上，占當時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從一個數據中，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屠殺對文化造成多大的傷害。「1949年，（上海）黃渡地區的青壯年中，81.4%是文盲。在貧農、下中農的家裡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如沈家浜村1949年前24戶人家，有19戶三代都沒有進過學堂，家家戶戶連一支鉛筆也找不到，寫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鎮上求人。」也就是說，殺掉農村的所謂地主富農，也就是幾乎殺光了農村裡讀書識字的人。

如果「鎮反」和「土改」主要殺地主、鄉紳，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屠殺城市中有資產的人士，也就是城市中受過傳統教育、懂得如何經營企業或商業，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會的人。這是在城市中製造恐怖氛圍並洗劫財富。

2) 剿滅宗教，割斷與傳統信仰的聯繫

傳統信仰是中國文化的源頭，畢竟文化是神傳給人的，而傳統的信仰則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國，影響最深遠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們告訴世人什麼是佛，什麼是道，怎樣做人。幾千年來人們信神敬佛，保持著道德水準不至於下滑得太快。

1950年，中共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即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們被鎮壓或殘殺，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歪曲佛經、道藏，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運動找根據。

正教被毀，鄉村地主、紳士階層、城市商賈被殺的殺、關的關，剩下的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

3) 思想改造，無神論占據學校

中共對知識分子精英的改造、鎮壓、剿滅也有著系統的安排。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等院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始於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對民國時期的教育專家和高級知識分子當然不放心。苦於沒有他們大學開不成，技術人才也無法培養，所以中共採取了所謂院系調整的辦法。它們直接取消宗教教會大學，因為宗教信仰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並改造私立學校，及取消原大學裡的哲學、社會學等院系，因為這些院系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對中共政權構成極大挑戰。同時中共全面照搬蘇俄教育系統，改變民國時期尊重思想和學術自由

的教育系統，強迫進行思想改造，把高等院校師生都培養成聽中共指揮、只重技術、無神無信仰的一代。

從1950年到1953年，經過院系調整，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4% 降至1952年的11%。一大批歷史悠久的優秀綜合性大學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地位，被改為工科院校；新設工科院校劇增，「向蘇聯學習」得到了徹底的貫徹。

採用「美國模式」的人文學科，在民國期間，產出了一批有相當影響和水準的學者，歷史學、哲學、社會學都不乏人才。這些受「英美自由主義」影響、教育的人文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資產階級」的記號。非馬克思主義體系的那些人文學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會學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

院系調整的另一個目的是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大學各科系及其骨幹教師，割斷了原來教授與學校的歷史聯繫，也就大大有利於共產政權對知識分子的掌握和駕馭，從而有利於共產極權的建立和鞏固。

原北大校長馬寅初於1951年10月2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地調整院系，□□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自覺自願地進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話，進行院校調整就是為了思想改造。

這次通過院系調整對教育專家、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後強迫知識分子就範的第一次行動。

4) 鎮壓知識分子，強迫全民說假話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分傳統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中共稱「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言者無罪」，這些表演頗見成效。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章伯鈞、龍雲、羅隆基、吳祖光、儲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種弊端。但一夜之間，風雲突變，反右鬥爭開始，他們都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分子」，27萬人失去公職，23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飯碗被搶走，生命難以為繼，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

這一運動除了讓知識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也向全體中國人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誰說真話，誰就面臨悲慘下場。更有甚者，在歷次運動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須參與「揭批」，連人們「保持沉默」的權利都剝奪了。

說假話可以說是中共黨文化裡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惡行之一。中共通過多次政治運動訓練中國人用黨文化思考問題、處理事務，使世人習慣說假話，對一切虛偽、謊言、造謠、顛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趨之若鶩。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到處可見的假菸、假酒、假藥、假食品、假文憑、假結（離）婚等，無處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夠出現和氾濫，不能不說是從人們習慣說假話開始的，一旦放棄「真」這個道德底線，還有什麼作假會讓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運動，是中共向徹底破壞中國傳統道德與文化邁出的重要一步。

隨著文化精英的消亡，共產邪靈截斷了中華傳統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綿不絕的傳承。此後的年輕一代也就無從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鄰里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變成沒有文化的一代。

經過三反、五反、鎮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毀文化、殘殺各類文化精英的運動，中國鄉村、城市那些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毀。同時唯物論、無神論、黨文化培養的新一代已經成熟，他們帶著暴力思想、行為開始進入角色，進行摧毀神傳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5) 將人改造為「非人」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發出，中共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毀壞傳統文化的運動，即文化

大革命。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的抄家、毆打、屠殺等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的「紅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評共產黨》一書中多有揭示，我們在此需要關注的是這些暴行從文化層面對中國人造成了何等的傷害。

僅舉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殺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毆打，有的是用鋤刀鋤，有的是用繩子勒死。嬰幼兒則一條腿被踩住，另一條腿被劈開，從而被撕成兩半。

這種暴行實施者的喪盡天良、人性滅絕自不必說，旁觀者也需要放棄「惻隱之心」才能忍受下來，也就是必須背棄中國文化中的「仁」的價值。

古人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種「非人」行為是中共所極力鼓勵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僅以廣西一省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兩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這一省，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在其後的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1999年開始的「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那些殺人多的、手段殘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質獎勵，乃至官位的晉升。最凶殘的指揮者，如羅干、周永康，則被

江澤民提拔到正國級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備其殺人、毀滅道德和文化的「功勞」。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動用了傾國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還包括令人髮指的性虐待、嚴寒下的冰凍、酷暑之下的乾渴、超過人體極限的體力勞動、超長時間的剝奪睡眠、讓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子咬法輪功修煉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牟取暴利等等。

這些大規模暴行已經構成了「反人類」罪。換句話說，只要還是人，就有義務反對「反人類」罪行，而中共強迫所有人參與到它們的暴力殺人、迫害正教的罪行中來，或被動地認同或配合這些罪行，也就是讓很多人喪失了識別好壞、是非、善惡的標準，而變成助紂為虐的「非人」。

神來度人、拯救人，針對的是還能被稱為「人」的人。當中共強迫人變為「非人」時，就是在斷絕他們得救的機會，也就是在把人推入地獄。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讓人們實施暴力、殺戮世人時，告訴人們殺人是應該的，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共每一件惡行都在有意地為建立它們用以毀壞傳統文化、敗壞人們道德的黨文化添磚加瓦。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變成了共產邪靈的打手、殺人工具。

4. 破壞自然

神不只是造就了人類，也為人類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環境。特別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及其通天的內涵，也體現在自然環境中，這正是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體體現。名山大河中其實都有山神、河神維繫著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中國作為神選定的「中心之國」，其山川河流對整個地球生態的影響巨大而深遠。在中國文化中，地理風水的影響和作用實際上超越肉眼可見的空間。從高層次上看，在全球水循環體系中，中心之國也是全球淡水水脈的發源地，這裡的淡水污染會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國環境的破壞，可能造成世界範圍的生態走向崩潰。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共產邪靈處心積慮，必欲毀壞中國的自然環境。

中原皇朝的歷代聖皇明君都定時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謙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環境所賜予人類的生活所需。數千年來，信天敬神的中華子民一直和自然環境和諧相處。而共產邪靈奪取政權之後，同樣是利用暴力加欺騙挾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壞神賜予的自然環境，鼓勵人們戰天鬥地，發揮人性中惡的一面，為了賺錢肆意破壞自然環境，使人變得狂妄自大，全無對自然環境的敬畏之心。

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採伐森林時，總要保護尚未成材之樹，絕不亂伐。中共建政後，則普遍採用毀滅式、破壞性的採伐手段，為眼前利益不顧後果地毀壞森林資源。如長白山地區砍伐森林時，不成材的照樣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小樹也不能倖免，被砍倒

用作掃帚把。很多地區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頭」一樣毀掉，植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結果當然是各種災害接踵而來，或曰「天懲」，而中共培養出來的無神論者對此自然不會承認。

宇宙、地球、人類整個環境是循環的。人在生命輪迴中，當道德高尚時，沒有多少業力，輪迴轉生後對自然環境也沒有多少壞的影響。但當人們業力積攢越來越多時，也終會將業力帶到生存環境中，影響周圍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惡果之一。

中共建政以來，人們道德迅速下滑，業力劇增，無度地揮霍、浪費自然資源，毀壞自然環境，中國大好河山瘡痍滿目，沙漠面積急劇增大。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擴大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達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紀已超過3000平方公里。內蒙古歷史上曾經有五大草原讓世人稱道，如今有三個已經基本消失。烏蘭察布草原、科爾沁草原和鄂爾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積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懷來縣人稱「天漠」的飛來沙漠現在離北京僅70公里，北京或許就將是下一個消失在沙漠中的樓蘭古城。

中共任意亂砍濫伐，堵河填海，與天鬥、與地鬥，已然破壞了神為人生存所創造的環境。各種災害越來越多，江河氾濫、陰霾毒人、沙塵滾滾；乾旱斷水、工業污染、地脈水脈被斷、極端氣候頻繁出現，屢創紀錄；更有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奪走世人生命，真可謂觸目驚心。

5. 毀滅文化

從暴力殺戮精英階層、暴力摧毀人類賴以生存的精神、物質環境，到暴力毀滅人之所以為人之傳統文化，都是共產邪靈有計劃、有步驟地毀滅人類的安排。

1) 毀物質載體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破四舊」的邪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破壞殆盡。

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去即無法還原。

北京城建於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讓丞相劉秉忠按天宮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個北京城浸透了儒、道、佛之思想與文化，大都城門和大殿名稱多出自於周易乾坤之象，廟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

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套小院，不光別致，還有乾坤結構寓於其中，有些正房儼如廟堂。曲徑通幽是對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穿過幽徑進入四合院後，豁然開朗，別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間建築瑰寶，將人們心中對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傳統理念與周圍環境、建築融為一體，實為絕世之作。但是絕大多數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及其後的所謂開發建設中毀掉。

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尚有500餘座古廟、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之後，幾乎全毀。所有這些，不止是毀壞了信徒們禱告及修煉的場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築，更把人們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傳統正念一起毀掉。世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覺得與我無關，其實共產邪靈無孔不入，從肉體消滅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壞正教修煉環境、場所，它斬斷了中華文化、道德、信仰綿延幾千年的傳承。

中國幾千個城鎮，歷史悠久，每個城鎮都有城牆、廟宇、寺院，文化古蹟處處皆是，挖地一尺，看到近代古蹟，兩尺、三尺、二十尺，歷代古蹟，數不勝數。

宇宙中，人世間，各種理論、信仰、文學藝術形式、建築、風俗等等都有其人類空間的顯現及另外空間存在的形式。一個人讀一本書，做一件事，不算什麼，當千千萬萬個人都在讀同一本書，做同一件事，有同樣所想，就會在另外空間形成巨大的物質場，並支持表面空間這件事、這個形式、建築、風俗等。如果沒有這個背後的場，這個空間的事物、建築、形式等也就不會有多大能量。這也是為什麼西方相信的13日、星期五的組合不吉利，但其對東方社會則沒有什麼影響；而東方的風水寶地風俗等也對西方沒有很大影響，因為其背後的場在另外社會中不夠強大。

古廟、老城、寺院、古蹟等經過千百年及千萬人的同一信仰、關注，有其背後強大的物質因素，特別是正教的殿堂，開光後有覺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靈、民眾。當這些器物、建築被毀，其背後的場以至高級生命也無法繼續駐留。所以毀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築、形

式及其背後天人合一、加持人類空間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場，還有覺者離去而失掉的佑護。

同樣道理，即使重建這些古蹟、建築，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立強大的正能量場，請回高層覺者加持、佑護。近些年中共又大興土木，重建寺廟、修復古蹟，但為的是欺騙、賺錢、造假，或裝門面，那結果只能是招來邪靈、爛鬼、負的能量場占據這些地方，給世人反而帶來無窮禍害。

共產邪靈深知這些，所以它們要毀掉城市文化精英、鄉村紳士階層，敗壞世人道德，同時毀掉寺廟、神傳文化古蹟、傳統風俗、文學藝術形式、文物、字畫、書籍、傳統民居等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及精神支柱。

2) 壞精神支柱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經》，是道家修煉之經典，老子被奉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為虛偽，其《道德經》則被稱為封建迷信。

孔子周遊列國，講述「仁、義、禮、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訂先皇治國理事、入世為人準則之六經，因此被後世稱為「至聖先師」。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稱為孔老二，仁、義、禮、智、信、中庸等被暴力、鬥爭、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讓北京造反派頭頭譚厚蘭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率領紅衛兵到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壞，燒毀古書，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

碑近千座，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還刨平孔子墳墓，掘開其他孔氏後代的墳墓，曝屍批判數日後，將其焚毀。

這已經不是簡單毀壞典籍和文物的問題，因為這些典籍文物中承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和傳統價值。如果對傳統文化有著絲毫的敬畏，這樣的破壞都不會發生。這樣的破壞如此暴烈、徹底，乃是中共已經將對傳統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紅衛兵」的心裡。

中國古代曾發生過「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每個滅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殺，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是滅佛的報應。後周世宗柴榮曾親自拿大斧子砍大悲寺觀音菩薩像的胸口，最後自己死於胸部瘡口潰爛。那些在中共的煽動下毀佛毀道的年輕人，如不能懺悔贖罪，會有怎樣悲慘的遭遇呢？

在這場狂飆突進的「破四舊」中，不知道多少人造下了會下地獄的罪業，這正是中共想要的結果。

6. 邪惡之最

1) 迫害法輪功

文革後期，人們渴求身體健康，開始了健身鍛煉。古老的五禽戲、太極拳、易筋經等傳統功法悄然興起，很快掀起了氣功熱。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傳出了以信仰「真、善、忍」為本的法輪功，

又稱法輪大法。大法至簡至易，從祛病健身開始，僅短短幾年，經口耳相傳，就有上億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國，洪傳全球。

法輪功歸正人心，法輪功學員修心向善、努力淨化自己、重回對神佛的信仰，被邪靈視為眼中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法輪功的傳播帶動了整體社會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昇華，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隨著大法洪傳，更多世人走進修煉，勢必讓人類走向正道，讓江山重歸清明。

中共邪靈的終極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道德來阻斷人得到創世主的救度，自然將法輪功視為第一大敵。

1999年7月，中共邪黨前黨魁江澤民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其修煉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眾生，包括負面生命，也曾一再給它們機會，讓它們放棄敵對，獲得新生。但共產邪靈執意與大法及修煉者為敵，必然是自掘墳墓。

它動用所有媒體、公安、武警，造謠誣衊、逮捕、監禁大法修煉者。江澤民在部署迫害法輪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狂妄地宣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

如果沒有共產黨幾十年的殺戮積累的恐怖和整人經驗，迫害法輪功能這樣就搞起來了嗎？法輪功學員修心向善，身體健康，當時有上億的法輪功學員，每個學員的親朋好友加起來，那是多麼巨大的一個群體。為什麼說打壓就能打壓得了呢？江澤民下令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正是中共積累幾十年的邪惡的總

爆發。幾十年的殺戮造成的恐怖環境，讓中共不需要大規模公開地殺戮，也能把這場迫害搞起來。

共產邪靈有效地用經濟手段捆綁自由國家，使其無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時隱蔽地實施暴力殺戮和迫害。難以計數的大法修煉者無辜被判刑、關押、殘殺，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卻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黨多年高壓、洗腦、殺戮中噤若寒蟬，變得麻木不仁，對迫害視而不見，甚至違心地順從、參與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綁走上毀滅之路。

我們想特別請讀者注意並思考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很多被關入拘留所、勞教所和監獄的大法弟子遇到過類似的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也就是只要他們簽下一紙不再修煉的「保證書」、「悔過書」和「揭批」法輪功，就立刻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的直接釋放回家。

這種現象的古怪之處在於，在過去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擊者即使低頭認罪，也仍然繼續受到批鬥、關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輪功學員是否遭受酷刑甚至獲得自由卻似乎是自己可以決定的。難道中共變好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對所有堅貞的法輪功修煉者，各種超越人類語言能夠描述的極限的酷刑就被輪番使用。從酷刑的種類、程度和廣泛性來說，中共的殘忍邪惡沒有絲毫的改變，甚至變得更壞，但只要法輪功學員放棄修煉，中共就似乎網開一面。這恰恰再次證明了中共的目的是為了真正地毀滅人，不僅要毀滅人的肉體，更要毀滅人的靈魂。這一方面是出於邪靈對神佛的仇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法輪功的傳播帶動了

整體社會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昇華，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作為通過毀滅文化、道德和阻斷人得到創世主救度為終極目的的中共邪靈來說，當然將法輪功視為第一大敵。

2) 活摘法輪大法修煉者器官

共產邪靈集古今中外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用人類地球上從未有過的最邪惡手段迫害、虐殺法輪功學員。

在共產邪靈的眼中，法輪功修煉者堅定的信仰和無畏使它們過去很多得心應手、百試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對那些它們轉化不了又無計可施的法輪功修煉者，活摘器官就成為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經濟利益不僅能維持迫害，還吸引全世界的人為了活命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用錢買活體法輪大法修煉者的器官，其實也在幫助中共殺人害命。這同樣也是邪惡所要的，即進一步達到毀滅全世界人的目的。

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與加拿大前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首次發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該報告以18種證據證明，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是真實存在的，並稱之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經國際調查員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殺」更新調查報告》發表。該報告

以680頁的篇幅、近2400條參考資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實性質和駭人聽聞的規模。

2016年6月13日，根據所有這些調查、取證，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343號決議案，譴責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器官，要求對中共器官移植濫用問題進行可信、透明和獨立的調查。自由世界終於開始認識到了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大法及其信徒們的邪惡程度。

結語

在過去一百年中，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害死了超過一億人。在蘇俄、在柏林牆下有多少冤魂仍在遊蕩，得不到超度；其它共產政權在蘇俄及中共支持下殺害了多少本國人民！柬埔寨那麼小的一個國家，卻有幾百萬人民被波爾布特共產政權虐殺，萬人坑裡的累累白骨記載著共產紅魔的殺戮惡行。最近的朝鮮共產極權黨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殺包括自己親人家屬在內的黨內及普通世人，還以核大戰來威脅世界。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部的殺人史，每一頁都染著世人的血跡、都記載著共產邪靈百年來一路暴力嗜殺的惡行。

本章梳理中共充斥著暴力殺人和毀滅文化的歷史，並不只是揭露這些屠殺和破壞本身，更要說明這兩種手段都是共產邪靈用以毀滅人類的手段。同時揭露世人看的到的表面後果和世人暫時還看不到的可怕結局。

在這傳統文化被毀、道德敗壞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隨波逐流，已經失去了最後能聽懂神的教誨的能力，面臨著徹底被毀的結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識到大劫在即？

中共邪惡罔顧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惡至極的最後一步。善惡終將有報，邪不勝正是宇宙間永恆的真理。對世人來說，保持純真、善良本性，堅守神為人類定下的道德規範、思想品行，重新走回傳統之路才是世人能走過生死大劫的保障。